

这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开国大典之夜。一个新中国在欢呼中诞生。(新华社)



“延安娃”盼来开国大典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文刚 实习生 丁静

1949 年 10 月 1 日上午,北京天安门广场。来自首都各界的工人、学生、干部、市民、城防部队约 30 万众,举着临时赶制的五星红旗,还有用红绢糊的五角星灯,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开国大典。原海南省委书记阮崇武那时还只有 16 岁,正是一名高二学生,刚刚跟随大部队由延安来到解放了的北京城。

鬼子投降 我们高兴地跳高声地唱

阮崇武的父亲阮慕韩早年留学日本,193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回国后以大学教授的公开身份,在平津一带进行地下党活动,1937 年“芦沟桥事变”后离开北京,在晋察冀边区工作,后转移到延安。阮的母亲独自抚养家里 7 个孩子。1943 年,日本军队横行中国,一旦阮家的抗日背景暴露,全家人性命堪虞。阮母在万般不舍之下,决定让 15 岁的三女儿带着 10 岁的大儿子离开北京,去寻找父亲。带着抗日的憧憬和生的希望,1943 年的年底,阮崇武和他的三姐,在地下交通员的护送下,历经半年的时间,千里奔走,几经转折,从北平走到了延安。这一别就是 6 年。

从 1944 年 5 月 4 日到达延安,到 1945 年 10 月底离开,在延安的短暂生活,为阮崇武的一生打下了深深的红色烙印。生活虽然艰苦,但革命圣地的火热激情,却滋养了他坚定的革命信念。

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的那一天,是阮崇武对延安生活记忆最深刻的一天。就在那天晚上,住在宝塔山对面的窑洞里的阮崇武看到,四周山头上相继点起了火堆,好多人用喇叭高声喊“日本投降了!”“日本投降了!”大家都冲出窑洞,高兴地跳,高声地唱,山头 and 山头之间歌声激荡……

鬼子投降了,阮崇武跟着部队离开延安一路行军,到达张家口,进入了边区联中。后又随学校回到了刚刚解放的北京,进入了北平师范大学男附中。

揣上馒头 广场拉歌欢呼等盛典

“1949 年 10 月 1 日早上六时多起床,吃完早饭,学校就组织我们出发了,每人揣上两个馒头,直奔天安门广场。我们学校位于宣武区和平门南新华街,毗邻天安门广场,不一会儿功夫就到了。”虽历经六十年时空转换,阮崇武依然鲜活地把我们拉回开国大典那激动人心的一天。

当时天安门广场上,有东西三座门(正式名称为长安左门、长安右门)及南面长长的甬道,甬道两边是长长的红墙,正南门即砖石结构的中华门都还存在,形成了一个丁字形的封闭的会场。与 8 个月前

北平刚解放时的天安门前相比,可说是焕然一新,广场也宽广平坦多了。

此外,在现在国旗旗杆的地方竖了一根当时看来已很高的旗杆,旗杆上有一个金色的顶。中华门外正阳门、前门箭楼两旁的许多建筑物上都张灯挂旗。“北平东站”、“北平西站”的大字一夜间都改成“北京东站”、“北京西站”了。金水桥北没有现在的观礼台,只搭了两个简单的台子,供大会指挥和外宾观礼。

“我们学校分配的位置较偏,在天安门广场南部,离阅兵仪式的长安街挺远,同学们来到广场上,大家一起拉歌,一起高喊‘毛主席万岁’,热情高得很。广场上的群众分区席地而坐,很有秩序,没有人乱走动。”

“转眼到了中午,同学们啃着馒头,没有水喝,就硬咽下去。”阮崇武说,在天安门广场上七八个小时里没上过厕所,累了就地上坐会儿,每个人都积蓄着热情,等待着。

开国大典 欢快浸满每个人的心

下午 2 点 55 分,毛泽东和一代开国元勋们经由新华门来到天安门,从西头马道登上天安门城楼。在金水桥南大约 50 米处的以华北军区军乐队为主组成的联合军乐队,奏响了《东方红》乐曲,广场上的人群欢声雷动。“毛主席的讲话从天安门广场的喇叭中传来。”时至今日,阮崇武模仿着毛泽东宣布——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!”惟妙惟肖。虽然看不到长安街阅兵和群众游行队伍,大喇叭传来的每个字他都刻在心里。

阮崇武说难忘升国旗仪式,新中国的第一面耀眼夺目的五星红旗顺着旗杆,冉冉升起,与此同时,54 门礼炮齐鸣 28 响。54 门礼炮象征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中的 54 个民族;28 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英勇奋斗的 28 个春秋。广场上人群安静下来,注视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而美丽的五星红旗。随后在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等军乐的奏鸣中开始了阅兵式。每通过一个受阅部队,广场上都是一阵热烈欢呼,“虽然我们不能亲眼看到,但是欢快的气氛已经浸满每个人的心。”阮崇武说,“飞机飞过,有大有小,型号不一,但是在自己头上飞的不再是狂轰乱炸的日本飞机,也不是国民党飞机,而是人民军队自己的飞机,这是多么畅快的事儿啊!”

1952 年,阮崇武作为留苏预备部的学生,参加过新中国成立三周年的国庆群众游行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,作为公安部长、劳动部长的他也曾多次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过国庆群众游行,“但都没有开国大典那样激动人心。”

阮崇武说今年的国庆阅兵一定会守在电视机前。60 年,是新中国沧桑巨变的复兴梦想;60 年,是中华民族饱经风雨的奋斗历程。



阮崇武激情回忆
开国大典。

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的北京天安门广场,参加开国大典的行列中有来自首都各界的工人、学生、干部、市民等 30 万众,这其中就有一群“延安娃”的身影,他们都是革命将士的后代,他们的父母在前线浴血奋战,他们曾感受到父辈革命的艰苦卓绝、英勇无畏,学生时代的阮崇武、肖策能就是其中的两位。在硝烟中成长起来的革命后代,盼来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,倍感激动!



阮崇武(后排中立者)和马
本斋的子女在延安。

从马背摇篮 走到开国大典

文\海南日报记者文刚 实习生丁静

1946 年,国共谈判正在进行,双方边谈边战,内战在全国各地迅速蔓延。延安保育院的孩子在老师的带领下,由一支小部队掩护,向晋冀鲁豫边区紧急转移。孩子们背起小背包,打上裹腿,跟着大人跑过层层封锁线,活动在山西和河北一带较为安全的山区。这些孩子都是革命将士的后代,他们的父母大多在前线浴血奋战。原海南省政协副主席肖策能就是这些孩子中的一员。

“两个筐连起来放在马背两侧,孩子可以坐到里边休息。电影叫《马背上的摇篮》,准确地说,应该叫‘驴背摇篮’,那时马都支援前线作战了。”肖策能说,从延安过来时很艰苦,到了晋冀鲁豫边区时条件才稍好一些,有了“驴背摇篮”,走得累了,就在里边睡会儿。再后来有了驴车,几个孩子坐在车中,在颠簸的山路上行进。有一次驴车走着走着,翻下山沟,肖策能从车上摔下来,另外两个孩子掉到山沟中,所幸只是虚惊一场,没人受伤。

1947 年解放石家庄战役胜利,肖策能和其他孩子随后进入石家庄,住在车站的候车室里。一群孩子躺在地铺上,天花板上挂着一盏明晃晃的电灯,“我们是乡下来的娃娃,没有见过世面,第一次见到电灯,看着那么亮,稀奇得不得了。”

1949 年北平和平解放之后,9 岁的“延安娃”肖策能跟随大部队进入北京,这是他第一次到北京这座城市。而这时他的父亲正在湖北、湖南一带与国民党白崇禧的部队短兵相接。他的母亲因为工作原因,住在中南海旁边的南长街,距离天安门很近。那时的肖策能在八一小学上学,过着军事化的集体生活,只有周末或节假日时才能回家。

1949 年 10 月 1 日,学校放假,肖策能回到南长街母亲的住所,家里很安静,听说大人们都出去参加开国大典了,肖策能和一些小朋友就结伴跑到长安街上去看,没想到长安街两侧人山人海,人们争相往街中心的方向看去。

肖策能非常好奇,他钻过里三层外三层围观的人群,扒着长安街的栏杆往里望;步兵穿着黄色的新军装,手里端着锃亮的“三八大盖”步枪,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过;一队骡马拉着火炮隆隆经过;骑兵在高头骏马上,虽然战马毛色不一,但骑兵个个精神抖擞。每走过一个方阵,人群当中都会爆发出阵阵掌声,高喊“毛主席万岁”。

原来肖策能误打误撞地看到的,正是已走过天安门的受阅部队,在南长街与西长安街的交叉□处,他虽只看到了开国大典的一部分,却终身难忘。他说:“那是一支胜利之师,战士们身经百战,个个斗志昂扬。”

从延安保育院一路走来,肖策能的童年生活始终处在动荡之中。肖策能回忆说,很小的时候,听到飞机声就知道往沟里、树下钻,躲避敌机的轰炸。动荡中的学习没有参考书,老师找个房子,就当做教室,没纸没笔,就用大理石条在石板上写,写字之后擦去再用。吃着小米饭长大,“二米饭”在偶尔改善生活时才能吃到,这种饭以小米为主,掺上少量的大米,当时看来已经非常难得。

回忆 60 年的历史,肖策能感慨万千,“共和国六十年的变化可谓一日千里,六十年中也走过很多曲折的道路。改革开放以后,国家的发展突飞猛进,在社会建设的各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突破,今天的中国已经强大起来,未来的中国肯定更加朝气蓬勃。”

见证
开国
时刻

本版图片除资料图片外由海南日报记者 苏建强 摄影(翻拍)